

## 江户时代外国人眼中的富士山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向 卿

**[摘要]** 江户时代访日外国人总体上对富士山呈肯定和赞美的态度。江户中后期以后摆脱了宗教立场的西方人形成了对作为“自然景观”的富士山的一边倒式赞美。这种富士山认识对西方人乃至日本人自身的富士山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也与江户日本知识界创造作为“日本象征”的富士山形象的作业形成了呼应,发挥了促使富士山民族化的催化剂的作用。

**[关键词]** 江户时代 富士山 朝鲜通信使 西洋人

### 引 言

在现代,富士山作为与樱花同等的日本或大和魂的重要象征,在日本人心中有着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富士山是理想化了的日本人的姿态,是品格高尚的神的容貌。”<sup>[1]</sup>“所谓象征是指一个标志,即是说由此可以真实地知道国家本身或国民结合的实际形态。一看到富士山就知道美丽的日本国,一见到樱花就知道平和安详的日本春天。”<sup>[2]</sup>而且,如2012年富士山申遗时的注册名称“富士山:信仰的对象与艺术的源泉”所示,日本人也极力向世界推广富士山,以此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形象。

富士山作为日本第一高峰,原本具有成为日本象征的潜质。在江户时代以前,它实际上已被视作神山、灵峰而作特殊化对待。然而,富士山成为日本或大和魂的象征,主要是江户时代及其后富士山被重新发现的结果。换言之,江户日本基于此前日本人对富士山的特别情感和认识,重构了它作为日本精神象征的意义和价值。对此,江户访日外国人对富士山的认识则发挥了催化剂的重要作用。但国内学界对此重大问题几乎没有论述,而日本学者的论述则偏重于江户外国人对富士山的认识本身,结合富士山民族化的研究亦极为缺乏。

### 1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富士山

江户幕府虽然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却仍保留了一定的开放态势。被准许“江户参府”的朝鲜通信使及荷兰商馆职员、幕末西方外交官等因此留下了不少关于富士山的记录。他们关于富士山日本化的描述和认识作为“外部的视角”极大程度推动了日本人将富士山自我象征化的历程,增强了日本人对富士山认识的自信乃至正当性。

江户时代以后,对富士山极尽赞美地描述的外国人首推朝鲜通信使。壬辰倭乱后,从1607年到1811年朝鲜王朝共向江户幕府派遣了12次外交使节。他们在日时留下了不少有关日本各地风土人情的记录,其中也不乏对于富士山的美化式描述。其中,江户前期和中期的代表性论述分别是金世濂(1593-1646)的《海槎录》和申维翰(1681-?)的《海游录》。

关于富士山,1636年受邀赴日的第一次朝鲜通信使副使金世濂曾有这样的记载:“从富士山南麓行。山甚高壮,不作星峰,又无枝脚。一峰特起,四面如一,自下渐尖,状如覆鼎。高八十里,四时有雪。行路四五百里之间,皆可瞻望。峰上有井如池,山腰有穴生风,盖国中名山。游观者若不一月斋戒,必有坠死之患。若近江人则不然,盖毳

琵琶湖拆而富士山耸出故也。”<sup>[3]</sup>不难看出,前述文字基本上沿用了此前日本人关于富士山的看法,说明金世濂不仅对此十分认同,亦对富士山表现出格外的欣赏之情。因此,他还特意赋诗八首,盛赞富士山之壮观、美丽。<sup>[4]</sup>不仅金世濂如此,随行的朝鲜文人也作了不少有关富士山的汉诗,而且他们关于富士山的描述和认识亦对当时的日本学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关于这点,《海槎录》也有明确的记载:“十三日癸丑阴,……夕抵大垣。璘西堂送歌词两首曰:此乃乌丸大纳言所制,闻使臣富士山诗,脍炙国中,因此咏歌云。”(金世濂, 1914: 454)虽然金世濂也指出乌丸光广的评价不过“赞美之辞”,却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况。

1719年,为庆贺德川吉宗袭位而赴日的第九次朝鲜通信使书记官申维翰亦盛赞富士山之美,洋洋洒洒地写下一篇盛赞富士山的文章——《富士山赋》,极力颂扬富士山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舁倭(按:轿夫)东指云际,噪而呼曰富士山。余为停舆而望之。即一朵亭亭如白玉簪,直插青霄,半腹以下,云霞掩翳。又似太华山玉井露出白莲花矣,殆非世间所恒见。若使秦皇帝得此光景于琅邪台,当复驾沧海呼真仙耳。闻此距其山之趾四百余里,而今已在吾眼中。度海外诸山,无与富士山抗者。”<sup>[5]</sup>“倭人以得见其山真面目为贺。盖其高峰万丈,屹然撑空,状若圆簪。而脑顶以上白如玉,一尘不染。自山腰以下,亦生草木而不至郁茂,望之濯濯然。”(申维翰, 1914: 270)显然,前述文字不仅说明当时的日本人无论知识界还是民众都对富士山抱有特别的情感,也说明申维翰本人对富士山极度崇敬,而这作为外国人富士山赞美的典型论述对于强化日本人富士山优越性的认识是“恰好的论述”。

当然,朝鲜通信使对富士山也不是一味赞美,他们对日本人使其神圣化和神秘化的某些做法亦提出了批评。例如,1655年赴日的南龙翼声称“达栢两僧”所呈富士山诗歌“颇有夸大之意”,亦认为“富士山为国内第一名山,高八十里。……池旁水穴形如初日”实为“夸诞不经之说”<sup>[6]</sup>;申维翰则对日本人所信奉的“富士山一日自出,琵琶湖一日自开”“游观者必斋戒而后免于殃祸”等主张给予了

根本性的批驳。(申维翰, 1914: 319)

不过,朝鲜通信使总体上对富士山之美仍是呈现极度赞美的态度。因此,不仅仅是金世濂和申维翰,江户时代几乎所有赴日的朝鲜通信使及随同人员都留下了赞美富士山的文字,如赵綱的《东槎录》(1643)、申濡的《海槎录》(1643)、金指南的《东槎日记》(1682)等。这些文字作为“来自东方的认可”无疑增强了日本人对于富士山民族化历程中的文化自信。

## 2 西洋人眼中的富士山

与同处东亚(山岳)文化下的朝鲜通信使的富士山赞美相比,江户西洋人的富士山叙事不仅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而不排斥此前流行于日本人之间的将富士山神秘化的荒诞叙事,也因一体化的时空感而可以在“世界”的范围内来定义和认识富士山的美丽,而使富士山的美具有一种“普遍的”价值和意义。从这点上说,江户西方人的富士山赞美虽然同样作为一种“外部的视角”,却在促使富士山成为日本优越性象征的方面发挥了远超朝鲜人对富士山的认识的作用。尤其是幕末以后,随着西方被认为是“文明的标杆”和日本的榜样,它对日本人富士山自我优越性认识的形成则发挥了更有力和更重要的作用。

在江户时代,西洋人的富士山描述和认识大致可分为“16、17世纪”“17世纪末到幕末”和“幕末”等三个阶段。这些描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从对富士山的客观和特殊化描述向对富士山的普遍化赞美的转变。

16世纪中叶,随着天主教传入日本,赴日传教士形成了西洋人关于富士山的最早记述。他们每年都要向欧洲发送不少关于日本历史、宗教、政治及风土人情的报告,其中就不乏关于富士山的描述。若昂·罗德里格斯(Joao Rodriguez, 1558-1633)是1577年赴日的耶稣会传教士,在日(1577-1610)从事传教活动30余年,游历日本各地,留下了关于富士山的详细记载:“骏河国有日本最有名、最高和最美的山,称富士山。……富士山为圆

形，……。山顶由突出于同一山体的三峰组成，从山腰到山顶全是像灰一样干燥、松散的软土，山顶常年积雪。山顶有巨穴，中有火山口，不断喷烟。此处是日本全国各地巡礼者所来之地，因为山顶甚冷，故只有夏季土用时节才能至此。……巡礼者会向巨穴的火山口投入蛮刀、短剑等武器以进献，……。下山时，……有时很多人会由此折叠摔倒，并使不少人窒息而死。但这种死法被认为是一种极为幸福之事，因为他们之间流传着这种传说，那些死去的人已在幸福的地方，其证据便是他们后来会再度出现于死者的家庭。这或许是恶魔为了让人们相信其迷信而编造的故事。此山甚高，故无论从多远的地方看均呈圆形，其景色异常美丽。……有对此山之高进行夸张并广为流传的二行诗（和歌）曰，云总是通过最高之山的山顶而移动，来富士山时则只是过其山腰附近。有时呈麦秆帽子或帽子形状的圆而小的白云会悬于山顶，据当地有经验的人说，这是暴风雨将来的前兆。……山腰的横断面有一个被称为‘富士人穴’的细长洞穴，入其中而行，不可知其终点。据说，其中有放置了偶像的寺庙和祭坛。”<sup>[7]</sup>

稍后赴日的阿历桑德罗·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的富士山描述也继承了这样的观察视角。“在日本，富士山无疑是最高的山，而且它无论是什么角度都呈现同等的圆形。直到山腰，树木都十分茂盛，万年覆雪。由此至山顶则全为裸土，不长一木。顶上有巨大的火山口，深而不可见底。常常喷烟，不时喷火，故极为恐怖，看上去就像地狱的入口。”<sup>[8]</sup>

基于此前传教士的观察记录，费尔诺·格雷罗（Fernaõ Guerreiro, 1550-1617）编辑的《十六、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对富士山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和“完美的描写”：“途中有一座名为富士山的山岳，常被日本文人或画家称赞其高、其美。该山颇高，……故依其高而支配着一切。其高者，甚为特别，抵达该山前，三日间皆可见到。……此山无论什么角度都呈同等的圆形，此形状直达山顶，就像金字塔般优美地向上延伸。……因其堪称完美的形状，又因其树林以及平常包围山顶的雪、云、雾变

化多端，由此为观望此山的人们提供了愉快而美丽的景观。……其山脚和山麓有好几处被偶像般崇拜的寺院，其主要者则是该山被整体奉献的浅间神社。因此，在日本，此山被这些蒙昧的异教徒当成是神圣的山。……此国民通常对灵魂的救济所抱有的希冀和期待如此般愚蠢地被恶魔欺骗……”<sup>[9]</sup>

由上可见，传教士虽然承认并赞美富士山的美丽和高伟，甚至认为它具有“堪称完美的形状”，却是以一种特殊化的眼光看待富士山，即完全视其为一座“异国的”山峰；他们虽然对富士山信仰和平民的巡礼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客观介绍，却也认为它是“蒙昧的异教徒”被“恶魔之教”所欺骗的结果。显然，传教士的富士山认识包含了对富士山及其名物的赞美和对富士山信仰的否定等两方面内容。当然，随着德川初期天主教遭到禁止，此后西洋人的富士山论述或不再过多涉及宗教的内容，或转向了对富士山信仰的客观描述乃至肯定，这也使得赞美成为此后西洋人富士山描述和认识的主流。

继传教士后，被准许“江户参府”的荷兰商馆人员也留下了一些关于富士山的记载。在17世纪以前，他们可能是因为工作性质和兴趣的缘故，对富士山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注。因此，此时期其富士山描述的主要著作《日本传闻记》（瓦伦纽斯，1649）和《日本志》（蒙塔纳斯，1669）都只是根据耶稣会记录、商馆记录等编撰的日本国情介绍，不仅关于富士山的记载篇幅不多，也几乎都是对它的特殊化描述。它们偏重于对富士山高的描述，“其高达数英里，垂直而立，出于云上和半空中”<sup>[10]</sup>，几乎不见对它的赞美之辞；只是后者基于罗德里格斯的描述，对富士山信仰和巡礼者的参拜行为进行了奇异化的描述。

总之，17世纪以前西洋人的富士山描写和认识由于受到宗教因素的过多影响，而对富士山信仰大多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们虽然也是以一种特殊化的视角看待富士山，却也大体承认富士山之高之美，而这点不仅被后来的西方人所继承，更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17世纪末到幕末，从坎普费尔到西博尔德，荷兰商馆的不少医师、植物学家等都对富士山

进行了普遍化的“极具好感式”赞美。这些论述不仅对日本人的富士山自我优越化认识,也对西洋人的富士山认识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690年赴日而滞留在长崎荷兰商馆的医生恩格贝尔特·坎普费尔(Engelbert Kämpfer, 1651-1716)是江户时代对富士山展开“普遍化”而“艳羨式”赞美的西洋第一人。在日期间,他曾两次去江户,留下了其著名的富士山描述。“由此第一次仰望到了足以令人吃惊的高峰、世界上最美的山——富士山。”<sup>[11]</sup>“此山与特内里费岛一样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周围的群山与其相比,只不过是低矮的丘陵。因此,从很远处开始富士山就成了我们旅途中的路标,尤其是它还成了我制作地图时的一个标准。其形状为圆锥形,左右之形相等,姿态绝美,规模雄大,当可谓世界上最美之山。……山伏(按:修验者)在此建立祭拜风神的宗教团体,‘富士山’这个词是他们进行乞讨或其他说法时所使用的暗号。日本的诗人和画家们无论如何称赞、描绘此山之美,都不能认为是充分。”<sup>[12]</sup>不难看出,坎普费尔对富士山极为喜好,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因此,他不仅在世界的范围内来定义富士山,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山”,还嫌弃日本诗人和画家未能充分描绘出富士山之美。当然,不仅是对富士山,这位来自德国的医生兼博物学者似乎对日本的一切都极为喜好,故其旅行录里充斥着“美丽壮观的城池”“美丽的寺院”“美丽的城市”“拥有美丽花叶的野生植物”“美丽的景色”“肥沃的农田”“世界上稀有的幸福的国民”等赞美日本风情和风物的字眼。而且,坎普费尔回国后还开始撰写关于日本的见闻记,而相关内容则在其去世后以《日本志》(1727)的书名在英国出版。该书出版后迅速被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并被广泛阅读,不仅对18世纪欧洲日本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sup>[13]</sup>也对幕末及近代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可见,坎普费尔包含富士山之内的日本论述使富士山之高、之美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亦开创了西方国家“全面发现日本之美”的历史。这对富士山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继坎普费尔后,1775年赴日的瑞典植物学家

卡尔·彼得·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 1743-1828)同样对包含富士山在内的日本风景、日本人的勤劳等极为赞赏。在去江户途中,他写道:“除去在荷兰国内,我从没经历过如此愉快的旅行。在我看来,丝毫不逊于荷兰的景色。目前之美景即便简单也无法绘成画而让诸君观看,甚是遗憾。然而稻田被巧妙耕作,使众多村落相接,令旅客都无法确定其边界的美丽景色,为何像我这样的生手都会产生绘之于画的大胆举动呢?”<sup>[14]</sup>通贝里的这番话其实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日本的景色美得无法绘于画,再就是它让“我”这样的外行也产生了绘画的举动,言下之意就是:“日本风景冠绝全球。”因此,在江户参府后的返途中,他对富士山亦进行了极具好感式的描述。“此山乃此岛第一高山,常为雪所覆盖。山顶白雪皑皑,令人眩目,直冲云端,又透过云彩而熠熠发光。山麓宽大,至顶而成尖形,故侧面呈塔糖或犀牛角之形。日本人因祭拜风神而登此山,到山顶6000步,需花费三日。”(ツンベルグ, 1941: 146)“这次比以前更注意眺望高峰富士山。它让人觉得,其一侧山脚下平缓的原野一直向远处扩散。山顶高耸入云,透过四周的云彩而熠熠发光。”(ツンベルグ, 1941: 182-183)不难看出,通贝里的描述虽然并没有太多新意和独特之处,却充分显示了其对富士山的赞美和欣赏之情。

在德川后期,J·F·范·奥弗梅尔·菲舍尔(J. F. Van Overmeer Fisscher, 1800-1848)是继坎普费尔后对日本进行全面而纵情礼赞的又一代表人物。作为荷兰商馆职员,他滞留日本长达九年(1820-1829),对日本及其文化极为迷恋并对其进行了由衷的赞美。他声称,自己通过江户参府旅行(1822)等见闻了日本各地的美丽景色和风土人情,由此为其魅力所完全折服。“我完全被这个国家的魅力所迷住,但若要令人十分满意地描述出这个地上之天国及其美丽的自然和形状,则完全非我力之所能及。”<sup>[15]</sup>“日本的景色极其美丽,即便与我在瑞士、意大利等见过的地方比较,也绝无丝毫夸张之言。”(フィッセルa, 1978: 116)在菲舍尔眼中,日本不仅是风景极美的国家,甚至可说是最受造物主眷爱的富饶之国。“日本这个美丽的国家,

是最受神之恩惠的风土”，“它就像自太古时代起就被选为大地全体的储藏库那样，对人和动物提供着非常富裕的产物。”<sup>[16]</sup>显然，对日本抱有强烈“选民意识”的菲舍尔也对富士山进行了毫不掩饰的颂扬。“此日天气特别晴朗，富士山的全貌如今完全落入我们眼帘。我们沿着山麓不断前行，此地是最美而又最富饶的地方，其美丽之环境远超过我心中的想象。日本人欲以各种线画、写生画介绍此山，丝毫不足为奇。我们对此眺望无一丝厌倦，多次驻足观看，赞赏此美丽而又足以令人自豪的自然。此附近之地尤其人口稠密，又特别富饶。再者，富士山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再喷火，人们可以在此安居乐业，亦再无担心今后爆发之忧。”（フィッセルb, 1978: 221-222）因为这种发自肺腑的对富士山的热爱，他声称自己能够充分理解日本人对富士山的迷恋情结：“这也是我亲眼所见，就像那些描写了富士山形状的大量绘画、各种各样的铸件及歌咏了该山的众多小说、诗歌等所证明的一样，日本人不知腻烦地心醉于此山及其周边之美丽、肥沃，对此我亦能充分地理解。”（フィッセルa, 1978: 114）由上可见，这种由衷的礼赞无疑对日本人富士山优越性意识的确立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

与菲舍尔几乎同时赴日的德国医生兼博物学家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同样对包括富士山之内的日本风景和物品充满了兴趣和好感。在日期间（1823-1829），他不仅通过医疗、教学等扩大了其学说对日本人的影响，也全身心地收集植物标本、工艺美术品（包括几张描绘了富士山的图画）等日本物品，又在回国后撰写了《日本》《日本动物志》《日本植物志》等著作，全力向欧洲介绍日本的美丽和特别。从这点说，西博尔德是一位对西方的日本认识和日本人的自我认识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者。

关于富士山及其名物的描述，主要集中于他于1826年江户参府旅行时的记载。这次旅行充分体现了他对富士山乃至日本之美的着迷和由衷赞赏。“得益于绝佳春天天气的我们离开蒲原，在岩松村用经线仪进行经度观测，欣赏着可以看见富士山的绝妙景色。（我得以从日本的写生画师手

里弄到一张画有富士山喷火口的风景图。）……我们乘坐一艘具有很高舟缘的独特小船渡过了尚在快速涨水中的富士川。”<sup>[17]</sup>“在江户期间，不时所见的富士山实在是美丽极了。尤其是凉爽的早晨，视野清晰，直耸苍穹的金字塔形的高山看上去就像在眼前似的。……山腰以上则圆形隆起或呈尖峰形，其处爆发后的伤痕在清澈的大气中描绘着尖细的轮廓，这些景象直入眼帘，可遗憾的是只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呈现。这是因为随着稍后白昼温度的上升以致灰白色的面纱覆盖了白发的头部的缘故。白色卷发逐渐隐于雾中，遮蔽了火山力所创造的这幅巨大的作品。”（シーボルト, 1967: 220）“我又情不自禁地为被雪覆盖且高耸入云的山顶感叹并凝视着它。……欣赏山麓异常美丽的景色，亦十分让人愉悦。”（シーボルト, 1967: 222）显然，与此前商馆职员单纯的富士山赞美相比，西博尔德不仅对富士山及其相关景物充满了赞美之情，也对它进行了“崇高化”的描述，认为它是一座“不时地展现出崇高姿态”<sup>[18]</sup>的无上荣光的山。而且，他还在普遍化的视角下展开了富士山民族化的论述：“让我们将目光稍稍离开这些画看看。于是，在我们的眼前就有日本这样的国土，有一座绝妙的火山高耸入云、又被冉冉升起的朝阳所映照的和平的岛国。”<sup>[19]</sup>可见，这是一种以富士山为日本象征的明确论述，也清晰地显示了江户西方人富士山叙事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

相比于德川初期，18世纪以后西方人在普遍的视角下展开了对富士山及其相关景物的一边倒式的赞美及富士山日本化乃至优越化的论述。这种作业不仅使富士山之美具备了普遍的意义，还肯定了富士山作为日本精神象征的意义和价值，而为日本人以此构建自我及自我优越性的作业提供了“外部的证明”。而且，这种一边倒的富士山礼赞不仅对幕末日本人的富士山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几乎被幕末赴日的西方外交官和学者所继承。

在幕末，随着日本国门的打开，出于公务或对东方异国的好奇，不少英美等国家的外交官和学者纷纷来到日本，留下了不少赞美富士山和日本的记录。他们除了对当时日本人的混浴、性开放

和迷信等风俗提出批评外,几乎对日本的一切都很着迷并加以肯定。例如,他们对日本人的纯朴、朴素、勤劳、爱清洁等国民性给予高度赞扬,亦对包括富士山在内的日本风景之美表示了由衷赞赏,甚至认为日本是“得到上天厚爱的国度”<sup>[20]</sup>,并由此担心“强加给日本的西方文明”会给原本幸福的日本“带来莫大的罪恶”或“不可预知的灾难”。

可以说,幕府末期赴日西方人对岛国日本所拥有的“庄严的自然光景”(カッテンディーケ, 1964:207)几乎都是一味地褒扬和赞美,对富士山更是如此。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1804-1878)是1856年赴日的美国首任驻日公使。在日期间(1856-1862),他对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日本风景高度赞赏,曾自述说“我们一行都对日本人的容姿和态度甚为满意。我曾反复地说,日本人比好望角以东的任何民族都要优秀”<sup>[21]</sup>。这位对日本抱有极大好感的外交官同样对富士山大为赞赏:“这是无以名状的伟大的景象。……它为白雪所覆盖,在熠熠发光的太阳下看上去就像是被冻住的银山一般。其庄严孤高的姿态,我甚至认为比我于1855年1月间看到的喜马拉雅山脉著名的道拉吉里峰还要令人耳目一新。”(青弓社编辑部, 2010:202-203)显然,在哈里斯眼中,富士山完全是一座“伟大”而“孤高”的山峰。

作为哈里斯的翻译兼秘书,与其一同赴日的亨利·休斯根(Henry Heusken, 1832-1861)对日本及富士山的热爱则显得更为疯狂。他不仅对日本人的质朴、国土的富饶、人民之幸福等给予最高礼赞,更是以一种无比激动的心情表达了对富士山的热爱和赞美。“我一眼就知道那是富士山。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山的姿态,足以让我终生难忘。我并不认为,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匹敌此山之美。……无与伦比的富士山的流畅的棱线保持着左右的匀称而高耸入云,清浄的白雪映于夕阳,宛如光之山(按:重109克拉的钻石)一般,使青绿的山脉被遮蔽为淡墨色。我激动无比,不自觉地勒住了马的缰绳,摘下帽子,高声喊道:‘壮丽的富士山!’头冠悠久的白雪,威震四方而高耸于满目苍绿的日本原野。此东海的王者,愿你有永久之荣

光!举世无双的秀丽风貌真令人羡慕不已!”<sup>[22]</sup>不难看出,休斯根完全是以最高级的词汇来定义和表现富士山的美、自己对它的感动和赞美,可谓迄今西方人对富士山的最高评价。

稍晚赴日的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同样对富士山这座“几乎完美的圆锥形”的灵峰表现出极度的好奇和赞美。他由此成为首位登顶富士山(1860)的西方人,并使其富士山论述受到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和西方世界(其登山之事被登载于当时的《泰晤士报》)的关注。关于富士山,他几乎是借坎普费尔的话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远胜其他山峰而大放异彩’的富士山,就如坎普费尔所言,‘在美丽这点上恐再无与其匹敌之山。’……总之,对非世界人的日本人来说,正如坎普费尔所言,它或许是一座‘诗人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画家亦无法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再现此山所需要的充分的技术和色彩’的‘独一无二’的存在。”<sup>[23]</sup>不难看出,阿礼国的富士山礼赞虽然没有太多新鲜的内容,却进一步固化了富士山是“世界第一山”和日本象征的西方认识并由此增强了日本人对这一认识的自信。

稍后的英国外交官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亦对日本和富士山抱有特别的热爱之情。这位曾两度赴日任职的英国爵士在1869年休假回国时哽咽难言,表达了对日本的难舍之情。<sup>[24]</sup>在此之前(1867),他曾和画家查尔斯·沃格曼一同从大阪前往江户,途中见到了“富士山的秀丽姿态”。两人时而“入迷地凝视左侧低矮的连绵群山之上的美丽的富士山顶”,时而驻足观望“伟大的”富士山及其周边的秀丽景色:“远眺前方,这座伟大的山峰脚下的原野隐入了一直延伸到蒲原附近海滨的低矮群山后面,山腰处则白云翻卷。沃格曼立刻坐下来开始写生,而我至今还保留着他那时所绘的一幅作品。”<sup>[25]</sup>显然,“入迷地凝视”“伟大的”等关于主客体的情绪化描写充分表现了萨道义对富士山的赞美之情。

当然,除前述外交官外,幕府末期赴日的绝大多数西方人如罗伯特·福特尼(1812-1880)、卫三畏(1812-1884)、额尔金(1829-1888)、艾林波(1815-

1881)、艾米·亨伯特(1819-1900)、巴夏礼(1828-1885)、维托里奥·阿尔曼容(1830-1896)等都留下了盛赞富士山的文字。这些论述前继坎普费尔、通贝里等荷兰商馆职员的观点,后给明治以后赴日的小泉八云(1850-1904)、保罗·克洛岱尔(1868-1955)等西方人的对富士山的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 3 江户外国人对富士山的认识对日本的影响

江户访日外国人的有关富士山的论述尤其是其赞美式论述对当时的日本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江户知识界对外国人的关于富士山的论述极为关注,人员及书籍的交流、日本学者的所见所闻等便利条件也为他们了解外国人的富士山认识提供了可能。

首先,江户时代负责接待或可以接触外国人尤其是朝鲜通信使的多是当时的一流学者或幕府官员,如林罗山、木下顺庵、新井白石、稻若水等,而他们都与朝鲜通信使有过笔谈、诗文唱和等密切的文化交流,这说明彼此的富士山描述和认识可以顺畅地被对方所知。除前述金世濂与乌丸光广(1579-1638)关于富士山的诗文唱和外,曾为德川家康近侍的石川丈山(1583-1672)所以能写出汉诗《富士山》——“仙客来游云外巅,神龙栖老洞中渊。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也被认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朝鲜通信使的交流;<sup>[26]</sup>南画家池大雅(1723-1776)也曾向1764年来日的朝鲜通信使画师金有声请教富士山的画法,并受其画风的很大影响。从前述情况可以推知,江户外国人的对富士山的认识对日本学者甚至朝廷和幕府都产生了影响。

其次,曾滞留日本的西方人如坎普费尔、西博尔德等回国后出版了不少赞美日本和富士山的书籍,这不仅引起了西方社会对日本的关注,相关书籍后来也被引入日本,增强了日本人对富士山优越性的自信。例如,江户后期国学者黑泽翁满(1795-1859)以坎普费尔《日本志》(1727)的日译本《锁国论》(志筑忠雄译)为基础编辑而成的《异人恐怖传》(1850)就清楚地记载了这一情况。“今世,因西洋舶来之书,人们竞相持之并以为荣。此书非

为受彼之国风所夺魂之类,而是由荷兰人坎普费尔之口确实地称赞我大日本的国风为天下无比之好国风,又敬畏我国人之强大当是天下无双之书籍。”<sup>[27]</sup>

再次,不少日本学者也目睹或听闻了西洋人对富士山或其风物的喜好和赞美,这也促进了日本人对富士山作为“日本象征”的文化自信。例如,司马江汉(1738-1818)就以“亲历者”的口吻讲述了其对西洋人购富士山版画的自豪和惊讶,“此山之形世界中绝无。……于此,雕富士山图于板行、又经无边式按压而成版画,兰人往来时,竟需数枚。”<sup>[28]</sup>

不难看出,江户外国人的有关富士山的论述有着被日本学者广泛知晓的稳定而有效的渠道,这就使其中的不少论述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引述,而被用于证明富士山的美丽和作为日本象征的合法性。在江户前期,此类转述并不多见,而著名诗人大淀三千风(1639-1707)借中国的名山标准证明“富士山之神圣”的言论则是其典型,“大小异国均赞美富士山是蓬莱宝山,亦理也。”<sup>[29]</sup>到了江户后期,这类借外国人之口论证富士山独特性和优越性的主张已是俯首皆是。例如,旅行家百井塘雨认为,富士山之美已为各国所承认,其兼中国各大名山之所长,亦为日本的儿童妇孺所知,“原本富士峰之秀丽,不独为本朝古今所赞美,异国之书籍亦详也。谢肇淛云,(山)莫高于峨眉,莫秀于天都,莫险于太华,莫大于终南,莫奇于金山,莫巧于武夷,其他雁行而已。而富士山皆兼是。其神秀者面向不背,虽为儿童妇孺,亦知其名。不见而知其形者,唯此山而已。”<sup>[30]</sup>林吕亮也认为各国皆认可富士山之美,对此极度自豪,“其丽美嘉祥之状,言而不可尽。……山形入图画,万邦赏美之。”<sup>[31]</sup>

由上可见,江户外国人的有关富士山的论述已发挥了极强的“跨文化交际”效应,对江户日本学者的对富士山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在促使富士山的符号化即使它成为日本及日本文化的象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4 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东亚国家代表的朝鲜通信使基

本能以中立、客观的立场看待富士山。然各个时期通信使的富士山认识又不尽一致,也不呈明显的规律性。例如,对富士山“高八十里”之说法,金世濂予以“转述”而示认同,南龙翼则斥为“荒诞”;申维翰则对关于富士山形成、登山前须斋戒等富士山的神秘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不过,他们整体上对作为“自然景观”的富士山之美一致给予了肯定和赞美。

江户访日西方人的富士山认识则有明显的变化过程。在德川初期,传教士以一种特殊化的眼光看待富士山,而对日本人的富士山信仰进行了批判,却也极度赞赏富士山的风景之美;在江户中后期,摆脱了宗教立场的西方人在世界的范围内定义和看待富士山,开启了此后西方世界全面并最大限度“发现富士山之美”的一边倒式赞美模式。

总体来说,江户访日外国人总体上对富士山呈高度肯定和赞美的立场。这种论述恰好与江户

日本知识界塑造作为“日本象征”的富士山的作业形成了呼应。江户时代可说是日本知识界开始全面构建日本民族精神及其象征物的时代,而樱花和富士山则是其选中的两大重要的“具象性”存在。因此,继江户时代以前富士山被特殊化和神圣化的思维和操作后,江户日本知识界对富士山产生了“作为日本象征”的明确意识,并开始了塑造富士山这一形象的各种作业。因此,江户外国人的对富士山的赞美作为“外部的证明”不仅为这种作业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实际上也发挥了富士山民族化的催化剂的重要作用。

可以肯定地说,富士山之所以能成为当今日本“不容置疑的”民族文化象征,江户时代外国人的对富士山的赞美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户时代日本人的身份建构研究”(13BSS016)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向卿]

## 注

- [1] 青弓社编辑部编.富士山与日本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
- [2] 憲法普及会編.新しい憲法・明るい生活[M].東京:憲法出版會,1947:2.
- [3] 金世濂a.海槎録[M]//朝鮮群書大系統々:第四輯.東京:同文館,1914:431.
- [4] 金世濂b.槎上録[M]//朝鮮群書大系統々:第五輯.東京:同文館,1914:31.
- [5] 申維翰.海游録[M]//朝鮮群書大系統々:第三輯.東京:同文館,1914:267.
- [6] 南竜翼.扶桑録[M]//朝鮮群書大系統々:第五輯.東京:同文館,1914:340.
- [7] ジョアン・ロドリゲス.日本教會史[M].東京:岩波書店,1967:227-228.
- [8] 转引自中山和芳.開国以前、西洋人の見た富士山(下)[J].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45),1992:93.
- [9] フェルナン・グレイロ.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第1期第5卷[M].京都:同朋社,1988:227-228.
- [10] ベルンハルドゥス・ヴァレニウス.日本伝聞記[M].東京:大明堂,1975:70;モンタヌス.モンタヌス日本誌[M].東京:丙午出版社,1926:66.
- [11] ケンペル.ケンペル江戸参府紀行:異国叢書第6[M].東京:駿南社,1931:374.
- [12] ケンペル.江戸参府旅行日記[M].東京:平凡社,1977:147-148.
- [13] 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編.ケンペルのみたトクガワ・ジャパン[M].東京:六興出版,1992.
- [14] ツンベルグ.ツンベルグ日本紀行[M].東京:奥川書房,1941:130-131.
- [15] フィッセルa.日本風俗備考:1[M].東京:平凡社,1978:102.
- [16] フィッセルb.日本風俗備考:2[M].東京:平凡社,1978:86.
- [17] シーボルト.江戸参府紀行[M].東京:平凡社,1967:179.
- [18] シーボルトa.日本:第2卷[M].東京:雄松堂,1978:144.
- [19] シーボルトb.日本図録:第1卷[M].東京:雄松堂,1978:2.
- [20] カッテンディーケ.長崎海軍伝習所の日々[M].東京:平凡社,1964:208.
- [21] タウンゼント・ハリス.ハリス日本滞在記:中[M].東京:岩波書店,1953:24.
- [22] 日本国政府.世界遺産一覧表への記載推薦書[DB/OL]. <http://www.fujisan-3776.jp/history/index.html>,2018-06-20.
- [23] 日本国政府.世界遺産一覧表への記載推薦書[DB/OL]. <http://www.fujisan-3776.jp/history/index.html>,2018-06-20.
- [24] アーネスト・サトウ.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下[M].東京:岩波書店,1960:255.
- [25] アーネスト・サトウ.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上[M].東京:岩波書店,1960:287.
- [26] 木村三郎.富士山考:その造園史的意義について[J].造園雑誌,54(1),1990:15.
- [27] 黒沢翁満.異人恐怖伝[M]//文明源流叢書:第3.東京:国書刊行会,1914:226.
- [28] 司馬江漢.春波樓筆記[M]//名家隨筆集:下.東京:有朋堂,1917:419.
- [29] 大淀三千風.日本行脚文集[M]//甲斐志料集成:1.甲府:大和屋書店,1935:559.



- [30] 百井塘雨. 笈埃隨筆[M]//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第6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29:359-360.  
 [31] 林呂亮.富士山記[M]//上伊那郡教育會編.藤原拾葉:第8輯.諏訪:鮎沢印刷所,1940:63.

参考文献

- 渡辺京二.看日本:逝去的面影[M].杨晓钟,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中山和芳.開国以前、西洋人の見た富士山(上)[J].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44),1992.

作者简介:向卿(1973—) 男 瑶族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研究  
 联系方式:E-Mail:xiangqingch@163.com

A Study of Mt. Fuji in the View of Foreigners during the Edo Period

**Abstract:** Generally, foreign visitors to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showed high praise and affirmation toward Mt. Fuji. During the Late Edo period, Westerners who had broken away from their religious roots initiated overwhelming praise for Mt. Fuji as a "natural landscape". This understanding of Mt. Fuji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Westerners and even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It also echoed the image creation of Mt. Fuji, which was created by Japa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Edo period as "the symbol of Japan", and played a catalytic rol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ization of Mt. Fuji.

**Keywords:** the Edo period; Mt. Fuji; *Chosen Tsushinshi*; Westerners; nationalization of Mt. Fuji

Author's Information:

Xiang Qing (Male)Year of Birth: 1973  
 Associate Professor a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Culture  
 E-mail: xiangqingch@163.com

学术用语对照

教育学领域

| 日文        | 中文            | 英文                          |
|-----------|---------------|-----------------------------|
| 縦断研究      | 历时研究、纵向研究     | longitudinal study          |
| 情意フィルター仮説 | 情感过滤理论、情感过滤假设 |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
| 情報処理      | 信息加工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 初級学習者     | 初级学习者、初学者     | beginner                    |
| 上級学習者     | 高级学习者、高水平学习者  | advanced learner            |
| 推測統計      | 推断统计          | inferential statistics      |
| ストラテジー    | 策略            | strategy                    |
| 正の転移      | 正迁移           | positive transfer           |

(待 续)

参考文献:

- 戴炜华.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胡壮麟.新世纪英汉大词典(缩印本)[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劳允栋.英汉语言学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3版),2014.  
 卫道治,吕达.英汉教育大词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沈家煊译,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四版),2000.  
 川口義一,横溝紳一郎.成長する教師のための日本語教育ガイドブック(上)[M].東京:ひつじ書房,2005.  
 川口義一,横溝紳一郎.成長する教師のための日本語教育ガイドブック(下)[M].東京:ひつじ書房,2005.  
 近藤ブラウン妃美.日本語教師のための評価入門[M].東京:くろしお出版,2012.  
 迫田久美子.日本語教育に生かす第二言語習得研究[M].東京:株式会社アルク,2002.  
 白畑知彦,鈴木孝明.第二言語習得キータム事典[M].東京:開拓社,2017.  
 社団法人日本語教育学会.新版日本語教育事典[M].東京:大修館書店,2005.

(资料整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费晓东)